1. 政策导览

(1)政策文件

■ 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在文化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

为深化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政府职能转变，创新文化供给机制，引导社会资本积极参与文化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项目，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日前联合下发《关于在文化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正确导向。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坚持改革创新。深化对 PPP 模式的理解认识，加快观念转变。加大在文化领域推广运用 PPP 模式的力度，积极探索有利于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新举措、新途径，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坚持传承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充分挖掘文化知识产权价值，推动文化与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坚持合作共赢。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明确各方权责，营造规范有序的市场环境。鼓励各类市场主体通过竞争性方式参与文化领域 PPP 项目，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订立合同，实现合作共赢。

在规范项目实施方面，《意见》提出了五项要求。(一)各级文化、财政部门要充分认识 PPP 模式的内涵实质，规范开展项目物有所值评价和财政承受能力论证，严格入库审核把关，严禁突破财政承受能力上项目。(二)鼓励有文化项目运营管理经验的企业参与文化 PPP 项目长期运营，充分发挥其资源整合、管理经验和开拓创新优势，提升项目管理效率和运营水平。(三)各级文化、财政部门要指导项目实施机构结合 PPP 模式特点，创新运营方式，根据项目特点确定项目回报机制。(四)各级文化、财政部门要通力合作，严把项目入口关，加强项目实施监管。(五)各级文化、财政部门要依托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综合信息平台，做好文化 PPP 项目全生命周期信息公开工作，及时、完整、准确地录入文化 PPP 项目信息，提高信息对称性，增强社会资本信心，让项目阳光运营。

在政策保障方面，《意见》提出：(一)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文化、财政部门要积极协调配合，鼓励各地建立跨部门的 PPP 工作协调机制，加强政府统一领导，落实部门职责分工，形成工作合力，及时研究解决项目实施中的重大问题。(二)优化资金投入方式。各级文化、财政部门要积极探索创新文化领域资金投入机制，推动具备条件的财政资金从补建设向补运营转变。(三)丰富金融支持手段。鼓励各地政府性融资担保和再担保机构为参与文化 PPP 项目的小微企业提供增信服务。(四)发挥典型带动作用。对

于各地推荐的文化 PPP 项目，由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组织专家遴选后，择优向社会重点推荐。

（据文化和旅游部网，2018 年 11 月 13 日）

■ 国家广电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

日前，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管理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和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积极创新创优，不断推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节目，文艺创作呈现出良好态势。但是，一些文艺节目出现了影视明星过多、追星炒星、泛娱乐化、高价片酬、收视率(点击率)造假等问题，不仅推高制作成本、破坏行业秩序生态，而且误导青少年盲目追星，滋长拜金主义、一夜成名等错误价值观念，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以纠正。

《通知》包括七个方面的内容。一、牢牢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强化价值引领。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要坚持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俗，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正能量，坚守底线红线。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决遏制追星炒星、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各广播电视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加强结构化管理和宏观调控，减少影视明星参与的娱乐游戏、真人秀、歌唱类选拔等节目播出量，积极扩大新闻、经济、文化、科教、生活服务、动画和少儿、纪录片、对农等公益节目播出量，制作播出更多富有时代气息、格调积极健康、具有文化内涵的原创节目。三、鼓励以优质内容取胜，不断创新节目形式，严格控制嘉宾片酬。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节目制作机构要坚持以优质内容取胜，不断开拓创新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形式，摒弃浮华，注重节俭，力戒高价追星、铺张浪费，对影视明星参与节目的片酬要控制合理额度，倡导影视明星以社会责任心和使命感积极参与公益性节目，坚决纠正高价邀请明星、竞逐明星的不良现象。四、加大电视剧网络剧(含网络电影)治理力度，促进行业良性发展。严格执行已出台的电视剧网络剧(含网络电影)成本配置比例行业自律规定，每部电视剧网络剧(含网络电影)全部演员片酬不超过制作总成本的 40%，其中主要演员不超过总片酬的 70%。五、坚持同一标准、同一尺度，维护广播电视与网络视听节目的健康有序发展。各级广播电视主管部门要探索建立网台联动的有效管理机制，严把文艺节目的内容关、导向关、人员关、片酬关，存在问题的节目，网上网下均不得播出。六、加强收视率(点击率)调查数据使用管理，坚决打击收视率(点击率)造假行为。各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网络视听节目服务机构要建立节目综合评价体系，正确开展节目综合评价，正确看待、合理运用收视率(点击率)数据，坚决反对唯收视率(点击率)倾向。七、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强化主管主办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各级广播电视主管部门要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认真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强化主管主办责任和属地管理责任，层层传导，步步压实，形成对广

播电视和网络视听文艺节目追星炒星、泛娱乐化、高价片酬、收视率(点击率)造假等问题齐抓共管、长抓不懈的局面。

(据人民网，2018 年 11 月 9 日)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政府网站集约化试点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有关部署，推进政府网站互联互通融合发展，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政府网站集约化试点工作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指出，试点工作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打通信息壁垒、推进集约共享，提升政府网站管理和服务水平，努力建设整体联动、高效惠民的网上政府。

《方案》要求，试点地区要认真组织实施，按照统一标准体系、统一技术平台、统一安全防护、统一运维监管的要求，推进数据融通、服务融通、应用融通，重点做好以下工作：(一)建设集约化平台。平台建设可采用省级统建模式，也可根据实际情况选择省级、地市级分建模式。采用省级、地市级分建模式的，省级、地市级平台要统一标准规范，实现互联融通。(二)形成标准规范。编制集约化平台建设标准，对平台上各类信息数据的分类、格式和接口等提出要求，制定信息数据标准规范，实现平台资源统一调用、统一监管。(三)构建信息资源库。建设分类科学、集中规范、共享共用的全平台统一信息资源库，汇聚沉淀本地区各级各类政府网站信息发布、便民办事、互动交流等栏目或系统的信息数据，按照“先入库，后使用”原则，进行统一管理。(四)提供一体化服务。依托集约化平台信息数据资源，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提供标准一致、数据同源的信息数据服务。(五)强化安全保障。严格落实网络安全法和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安全保护有关要求，加强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工作，优先采购国产软硬件系统设备。

(据中国政府网，2018 年 11 月 9 日)

■ 北京市教委、北京市人社局印发《北京市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办学标准(暂行)》

为进一步规范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办学行为，提高办学质量，促进我市教育培训市场健康有序发展，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北京市教委、北京市人社局近日印发《北京市民办教育培训机构办学标准(暂行)》(简称《办学标准》)。

《办学标准》提出，此标准适用范围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由国家机构以外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面向社会举办的不具备颁发学历证书资格的教育培训机构。《办学标准》要求，从事中小学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生物等学科知识培训的教师应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证。教育机构应将教师的姓名、照片、任教班次及教师资格证编号在其网站及教学场所显著位置予以公示。不得使用居民住宅、地

下室作为办学场所。《办学标准》同时强调，民办幼儿园不属于民办教育培训机构范畴；开展 3 周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和儿童早期教育服务的机构、利用互联网技术在线实施培训活动的机构，其设置标准另行制定；国家及本市对中外合作培训机构的设置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此外，针对近年来培训市场出现的问题，《办学标准》强化了对办学方向、培训机构举办学科竞赛、培训时间、收费的规范要求。比如规定：教育教学内容不得违背党的教育方针；面向中小学生的民办教育培训机构，不得举办或变相举办各类中小学生等级考试、竞赛及进行排名，培训时间不得和所在区中小学教学时间相冲突，培训日结束时间不得晚于 20：30；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培训机构收费时段与教学安排应协调一致，不得一次收取时间跨度超过 3 个月的费用。

（据北京市政府网，2018 年 11 月 30 日）

■ 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提升假日及高峰期旅游供给品质的指导意见》

党的十八大以来，各地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要求，围绕满足人民群众旅游消费需求，着力扩大旅游产品供给，提升旅游服务水平，旅游综合效益和市场满意度明显提升。但随着大众旅游时代的到来，假日及高峰期旅游出行难、停车难、入园难、赏景难、如厕难等问题依然突出，直接影响到广大游客的体验度和舒适度。为有效提升假日及高峰期旅游供给品质，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发布《关于提升假日及高峰期旅游供给品质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了六项重点任务。（一）加强规划布局。加强旅游资源开发和产品建设的规划指导，科学调整区域旅游产品空间分布格局，东部地区要加快旅游产品提质升级，丰富产品供给类型，加强智慧旅游运用，缓解传统景区压力；中西部地区要加大旅游资源开发利用力度，增强可选择性、可通达性和可游赏性，缓解东部地区假日旅游压力。加强旅游资源普查，健全旅游资源动态更新和管理机制，编制旅游产品分类目录，完善假日及高峰期旅游消费导示制度。（二）强化弹性供给。各地要在人流密集度高的地段设置数量充足的移动厕所，科学合理配置男女厕位，提供厕所导航服务。在机场码头、旅游集散中心、景区换乘站等重点地区加开临时交通，加密运营网络，推进共享交通体系建设，有效提升运力，快速疏解疏导。（三）实施立体调控。加强内外合作，密切与线上线下旅游企业、主要客源地等机构和地区的对接，开展游客流量分析预测，提前制定旅游调控预案。注重旅游消费引领，及时推出新线路新产品，发布旅游消费指南，拓宽旅游活动空间，避免旅游消费冷热不均、结构失衡。（四）强化科技支撑。提升智慧旅游管理水平，加强与通信、交通、景区等机构的数据链接与共享，建立假日及高峰期旅游大数据采集分析平台，实现对景区、住宿、道路等旅游信息的实时监测。（五）做好应急救援。各地要提高安全保障水平，协调做好对游船、缆车、索道等高风险项目和设施设备的安全检查，强化对危险地带的安全防护。（六）完善供给体系。要牢牢把握旅游消费加快升级的特征，大力推进旅游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坚持全域旅游

发展方式，通过实施“旅游＋”战略，扩大产品供给，打造产品品牌，提高产品质量。

（据文化和旅游部网，2018 年 12 月 4 日）

(2)政策解读

■ 以 PPP 模式助力深化文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日前，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联合印发《关于在文化领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针对这一支持文化领域 PPP 模式发展的重要政策文件，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马峰介绍了文件出台的背景、内容、特点等相关情况。

马峰认为，《意见》共有四大特点：第一，突出文化 PPP 项目的运营核心。鼓励有文化项目运营管理经验的企业参与文化 PPP 项目长期运营，充分发挥其资源整合、管理经验和开拓创新优势，提升项目管理效率和运营水平。积极培育文化领域专业运营商，形成一批有实力的文化企业和上市公司。第二，强调优化文化 PPP 项目的回报机制。文件明确了鼓励通过盘活存量资产、开发性资源补偿等方式提高项目的经营性。在提供优质公共服务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挖掘项目的市场价值，提高社会资本投入的积极性。第三，明确组建文化 PPP 基金。促进 PPP 项目落地的一个核心环节就是解决融资问题。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快设立文化 PPP 基金”。在 2017 年中国 PPP 基金决策项目中文化 PPP 项目仅占不到 1%，获得支持金额占比不足 1%，急需设立文化 PPP 投资基金，通过专业化、市场化运作，推动文化 PPP 项目尽快落地建设。第四，确定文化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推广先行区。文化和旅游部、财政部将联合确定一批文化领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推广先行区，区内文化 PPP 项目可优先享受政策支持，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案例，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马峰强调，推进文化 PPP 项目要坚持规范运作，守住底线。要注重因地制宜，量力而行，不搞一哄而上。各地政府要认真评估本地财政承受能力和项目的经济社会效益，严格入库审核把关，坚决避免违规负债、保底承诺、回购安排等情形。各类社会资本要严格遵守国家对 PPP 的有关要求，充分做好项目的可行性论证，设计出良好的运作模式，提高项目可持续性。

马峰最后表示，文件的出台，只是文化领域推广 PPP 模式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让文件里的政策措施真正落地、落实。这就需要各级文化和旅游管理部门抓紧与财政部门对接，迅速将文件的精神落到实处，通过实实在在的工作，将文件的政策红利传导到地方、传导到企业、传导到项目，要将落实文件作为文化和旅游管理部门支持民营经济、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文化领域的重要措施。

（据中国经济网，2018 年 11 月 30 日）

2. 动态关注

■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开幕

11 月 13 日上午，“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开幕式在国家

博物馆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王沪宁表示，举办大型展览，就是要展示40年来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成就，在历史创造性实践中迸发出的巨大精神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作出的巨大贡献。进入新时代，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新时代改革开放旗帜，以更坚定的信心、更有力的措施把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展览设计了关键抉择、壮美篇章、历史巨变、大国气象、面向未来等主题展区，运用历史图片、文字视频、实物场景、沙盘模型、互动体验等多种手段和元素，充分展示40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发生的伟大变迁，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据中国网，2018年11月13日）

■ 全国发展乡村民宿推进全域旅游现场会召开

11月30日，全国发展乡村民宿推进全域旅游现场会在浙江湖州安吉召开。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长雒树刚出席会议并讲话，部党组成员李世宏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乡村民宿是乡村旅游发展的重要内容，是推进全域旅游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助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渠道。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乡村民宿和全域旅游工作。要充分认识发展乡村民宿的重要意义，牢牢把握乡村民宿发展的正确方向，统筹规划布局、狠抓基础建设，加强资源利用、提升开发水平，强化标准引领、塑造优质品牌，加强宣传营销、引导有效供给，创新利益联结、带动脱贫致富，切实聚焦重点难点，着力补短板、强弱项，优化乡村民宿发展环境，释放乡村民宿发展活力。会议强调，要统筹推进全域旅游工作指导、政策支持、体系建设、督促检查和首批县级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验收等各项工作。

（据《中国文化报》，2018年12月3日）

■ 第六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在成都开幕

一年一度的中国网络视音频领域最重要的年度盛会——“第六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于11月28日至12月1日在成都举行。此次大会以“凝心聚力 创造美好新视界”为主题，围绕融媒建设、精品创作、产业发展、技术创新等内容，深入发掘新时代网络视听文化的创新创造力。随着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兴起，网络视听行业也迎来了新机遇、新跨越。2017年，中国在线视频用户付费市场规模突破了200亿元。而到2018年，这个市场的规模已经有望达到350亿元，网络视听产业正进入爆发性的时代。第六届中国网络视听大会继续充当中国网络视听产业的“风向标”。今年大会亮点重重。据悉，约有2000余家机构6000多位嘉宾莅蓉参会，并举办聚焦内容创作的16场主题活动，包括：大会主论坛、精品内容创作峰会、网络电影论坛、视听+体育论坛、影视内容“走出去”论坛、网络综艺论坛等，业界一同探索新时代视听节目的创造性转化模

式与创新性发展路径。

（据每经网，2018 年 11 月 22 日）

■ 京津冀专家共商公共文化协同发展

11 月 29 日，由北京文化艺术活动中心、天津市群众艺术馆、河北省群众艺术馆主办的“融合 创新 共享——京津冀公共文化服务协同发展论坛”在京举行。来自三地的专家学者为新时期京津冀公共文化服务协同发展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不久前刚刚挂牌，在文旅融合背景下，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也有更多创新理念可以借鉴。中央文化和旅游管理干部学院研究员毕绪龙建议，可以从公共文化服务场馆，发挥文旅融合公共服务；可以将文化馆站的特色群众文化活动作为异地文化体验的内容；建设在乡村的新型阅读空间也可以发挥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的优势。全国的网红文化馆、北京市朝阳区文化馆馆长徐伟提出，公共文化产品也是产品，也得讲究需求、讲究内容、讲究结果，所以公共文化产品的服务能力是文化馆的行动轴心，而创意是文化馆的魂。

（据《北京日报》，2018 年 12 月 1 日）

■ “2018 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开幕

11 月 8 日起，“2018 北京·中国文物国际博览会”在保利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此次文博界的盛会将一直持续至 11 月 12 日，80 余户国内外参展商将在现场展卖中外古玩艺术品，文博界的专家还将在现场普及正确的收藏理念，并为观众鉴定收藏品真伪。本届博览会的活动主题是“讲好中国故事，弘扬文化遗产”。展会分一层、地下一层共计两层，总展厅面积达到 7000 平方米左右。110 个展位汇集了瑞典、尼泊尔、香港、台湾、北京、上海、深圳、厦门等地的知名古玩商，以及来自辽宁、吉林、黑龙江、上海、杭州、洛阳、广东、烟台、信阳、湖南 10 个省市的文物商店，数千件精美器物，品类涉及瓷器、玉器、丝织品、书画、天珠等十余种。此外，“隋唐大运河古陶瓷馆”也将莅临展会现场，作为我国保护大运河文化遗产的窗口，向公众展示运河故道发现的出土陶瓷文化遗存，重现昔日运河繁荣的景象，更为广大收藏爱好者、专家学者提供一个提升艺术鉴赏水平和研究中国古陶瓷史发展变迁的平台。

（据北京政府网，2018 年 11 月 9 日）

■ 首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开幕

为期 4 天的首届长三角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会 11 月 29 日在上海拉开帷幕。本届文博会由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党委宣传部联合主办，共吸引 330 家参展单位，其中上海 107 家、江苏 91 家、浙江 58 家、安徽 63 家、海外机构及进出口企业 11 家，聚焦服务国家文化发展战略和世界级城市群建设战略，探索提升长三角城市群文化软实力，旨在为全国文化改革发展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助力提升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创新力、产业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首届长三角文博会是对长三角文化产业创新活力、国际影响力和整体实力进行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对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的新理

念、新作为、新动能和新模式的集中检阅。它旨在吸引全国、全球优秀产业资源集聚，搭建长三角及中外文化产业的合作交易平台，力争用3年左右时间，使之居于长三角地区文博会矩阵的排头地位；用3年至5年时间，使之成为国内一流、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知名品牌。

（据《光明日报》，2018年11月30日）

■ 北京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徽宣传片获奖

第36届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闭幕式暨总决赛颁奖仪式在意大利米兰伦巴第大厦举行。由北京冬奥组委出品、北京国际体育电影周组委会选送的北京冬奥会会徽和冬残奥会会徽宣传片，在总决赛中经过激烈角逐，摘得“体育展示与广告”单元最高奖项“金花环”奖。意大利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创立于1982年，由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联合会和国际奥委会共同主办，是国际性体育影视盛会，素有“体育界奥斯卡”之称，拥有116个会员国。其活动宗旨在于借助电影电视的大众传播力量，展示丰富的体育世界影像，在全球范围内宣传体育知识，弘扬奥林匹克精神和价值观，传播体育文化；同时，提供一个国际化的交流和展示平台，激发全世界优秀的影视制作人创造出精良的体育作品，推动体育文化在人类现代文明中的进步。每年11月，在全球16个分站赛胜出的优秀作品被选送至米兰总决赛，争夺“奥林匹克精神”“体育电影”“体育展示与广告”等9个单元桂冠。本届总决赛历时6天，共有126家制片方的166部作品入围，55部作品获得提名，其中中国作品5部。

（据《北京日报》，2018年11月21日）

3. 媒体聚焦

■《疯狂的黄庄》与中国人的教育焦虑

编者按：近日，《疯狂的黄庄》一文在网上刷屏，文章中几位父母为了让孩子名列前茅付出了巨大的经济和精神上的代价，孩子们也疲于奔波在补习班中，这种不惜一切要给孩子补课的行为让观者无不惊诧，再次引发大家去反思中国的课外补习与学校教育问题。

有评论指出，这种焦虑不安的来源，还是优质教育资源太过缺乏。好学校资源数量有限，而且越来越呈现马太效应，资源都往头部集中。最终，供远远大于求，学校当然需要一些规则来做筛选。奥数、考试这些看似死板的方式，确是相对最直接和公平的办法。所谓的素质教育，在优质教育跟不上的时候，只能是空中楼阁，这也是奥数在国内几十年不衰最重要的原因。没有人希望自己孩子的童年是在补习班中度过的，但如果不这样做，在丛林式的升学环境中，谁也不愿意自己的孩子被拒之门外(据袁斯来、张莹：《疯狂的黄庄、砸钱的补课，为何中产家长都逃不过补习班?》，《第一财经资讯》，2018

年 11 月 26 日)。

在教育界人士看来，教育评价制度的单一是导致“校外培训”病毒蔓延的罪魁祸首。尽管近几年一直在强调高考改革和综合评价改革，然而，这样的改革依然没有触及到单一评价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依然是分数在评价学生。这样的评价机制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基础教育阶段，所有的学生都站在同一跑道上，而所有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跑到前面。从另一方面看，长期以来国家一直较为关注校内减负，出台了一系列校内减负措施，比如严格控制校内时间和校内课业量、禁止补课等，而这部分减下的“负担”却被处于“教育竞技”漩涡中的家长重新在校外补习班里找了回来。而类似于三点半放学这样的政策则直接驱动了众多无力接送孩子的家长将孩子送进补习班和托管班(据《“疯狂的黄庄”背后 谁在助推“校外培训”病毒蔓延?》，中宏网新闻公众号，2018 年 11 月 20 日)。

还有论者认为，目前，没有任何数据表明依赖补习班的学生在高等教育阶段表现更出色。学生上大学以后的创新能力，靠的不是重复性的补习，而是开放性的思维；一个国家的创新精神，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愿景，更不可能靠超前而冗余的补习课程来获得突破。据说，城市中等收入家庭有百分之三四十的年收入都要用于子女教育，这样的数据无疑是惊人的。不得不问一句：高昂的家庭教育投入之下，是否收获了相应的回报? 而社会是否从这种全民性的教育投入中获得了更好的发展? 毕竟，为竞争而竞争，不应该成为教育的最终指向。在竞赛班、补习班的竞争跑道上，最终夺得胜利的只是少数人，而多数孩子最终会沦为陪跑者。而且，他们会因为这场消耗大量精力与时间的陪跑，失去发掘自己独特潜力的机会，错过本可以单纯而美好的青春。这一笔巨大的“机会成本”，家长们理应算个清楚(据王中的：《＜疯狂的黄庄＞刷屏，教育起跑线应该怎样守?》，光明网，2018 年 11 月 24 日)。

■ IG 夺冠与电子竞技的发展

编者按：11 月 3 日，有着英雄联盟“世界杯”之称的 2018 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结束了最后争夺，来自中国 LPL 赛区的 IG(Invictus Gaming)战队以 3：0 完胜来自欧洲的 Fnatic 战队获得冠军，这是英雄联盟这款游戏自诞生以来，中国大陆战队首次站上全球总决赛的冠军领奖台。IG 的胜利引发了社会对电子竞技的热烈讨论。

有评论者认为，“IG”夺冠事件刷屏背后，不只是爱好者对电竞赛事的热衷，还有渗透在游戏领域的家国情怀。主流媒体对于 IG 夺冠的接纳和祝贺，也给予电子竞技一次洗清污名的机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电竞被等同于打游戏，“电子海洛因”的污名让这项相当前沿的体育竞技运动不被主流接纳认可，指责电子竞技是奇技淫巧、年轻人玩物丧志的声音，从未消失。但事实上，早在 2003 年，电子竞技就被国家体育总局纳入了竞赛项目。电子竞技走向正规化的趋势不会变化，伴随着社会话语权的更迭，以及自身的逐步产业化，电竞将加速去污名化的过程。而电子竞技的正规化，一方面意味着

抛开那些不必要的偏见，去接纳年轻人的兴趣爱好；另一方面，电子竞技所秉持的竞赛对抗精神，是它与网络游戏的截然分野。为电竞正名，并不等于为网游正名(据光明网评论员：《IG 夺冠，新生代的另一种体育强国梦》，光明网，2018 年 11 月 4 日)。

有评论者由 IG 的夺冠联想到电子竞技的发展，提出电子竞技面临的急需解决的问题。其一，是俱乐部对于队员的管理后勤问题。目前，整个电竞俱乐部的管理相较于传统竞技俱乐部较为宽松。如果俱乐部没有专业性，那么专业的比赛和竞技将无从谈起。其二，是观众问题。电子竞技的观众中有一批极易将自己的游戏情绪带到比赛中，对比赛失利的队伍进行网络攻击。只有受众欣赏水平的提高，在意一个对抗竞赛的过程而非结果，整个电子竞技才能向更优良的方向发展，才能扩大这项运动的欣赏范围和人群。其三，是队员成长问题。电子竞技的队员选拔来源一般都是在游戏里面等级较高的玩家，很多时候并没有一个完善的培养机制。队员在日常仪表，语言谈吐，文化常识方面可能比较薄弱，并且在社会责任感方面有所缺失，很容易对青少年形成坏的示范作用(大熊游戏：《电子竞技怎么做才能比肩传统运动？路还很长！》，东方体育，2018 年 11 月 18 日)。

有评论者为电竞行业的发展提出了具体方向。首先，电子竞技产业必须要对自己的定位有着清醒的认识，如何将电竞和电子游戏在概念上严格地加以区分，正确地规范和引导青少年的游戏行为，将会是电竞行业在未来立足于主流舆论的关键所在。其次，电子竞技必须坚持清晰、规范和职业。选手的选拔过程、薪资、商业运作尽量全面而客观地展现给大众；电竞比赛的准入规范、资金运作的商业规范、俱乐部运营的制度规范，必须实行和坚持严格的标准；电竞从业人员都应该有着坚定的自我职业操守，树立电竞的良好形象，维护电竞环境风气。最后，优先软文化的建设，树立自己健康的品牌形象，让更多的民众感受到电子竞技的独有魅力，正确地引导青少年对待电子竞技与自我人生价值的实现(霍森：《IG 夺冠帮 LPL 圆了 7 年的梦，中国电竞的路并没有因此而平坦》，腾讯体育，2018 年 11 月 5 日)。

4. 尖峰观点

■ 梁建强、刘晶瑶：特色小镇建设不能沦为“凑数工程”

葡萄小镇、胡椒小镇、马铃薯小镇、油茶小镇……各地以农作物命名的小镇众多。特色小镇项目不够，“农作物”来凑。特色小镇的概念，在一些地方被滥用、泛化，甚至成为为完成指标任务而贴标签的“凑数工程”。

“凑概念”现象的背后，实则是一些地方特色小镇建设中贪多求快、盲目跟风的“指标要求”作祟。有的地方，在特色小镇建设中“摊派”指标，一级级明确特色小镇的建设数量。因此，为了达到指标要求，有的地方在条件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为了戴上特色小镇的“帽子”，只得把在田农作物或成规模传统种植、养殖业作为特色小镇项目进行申报；一些产业园区也“摇身一变”，在未经过任何重新规划、重新打造的情况下，直接

一步到位“变身”为“特色小镇”；而一些“农机小镇”“灯具小镇”“电梯小镇”等，雏形均是当地的工业园区。此外，被“凑概念”的还有一些房地产项目，以“特色小镇”之名，行房地产项目“圈地”之实，让特色小镇偏离了建设的初衷。

近年来，特色小镇的建设驶上“快车道”，有着客观的政策背景。2016 年，《关于开展特色小镇培育工作的通知》发布，其中明确提出，到 2020 年时，我国将培育 1000 个左右的特色小镇。然而，在实际的推进中，随着各地纷纷上马特色小镇项目，有的地方出现了建设项目要求的“层层加码”，导致乱象丛生。另一重原因在于以特色小镇的名义套取政策支持。比如，多地明确提出，给予特色小镇一定的优惠政策，于是在“贴标签”虚报的背后，也有着享受特色小镇建设用地指标、配套资金政策的现实考量。

作为产城融合的一种创新经济模式，特色小镇原本被寄寓了推动高质量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期待。但一些地方在执行中出现了走样、变形的问题，必须给予重视。完善相应的考核、监督与退出机制，刻不容缓。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在《关于建立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高质量发展机制的通知》中强调，坚持规范发展，统筹规范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创建工作，把握内涵、纠正偏差、正本清源，坚决淘汰一批缺乏产业前景、变形走样异化的小镇和小城镇。同时，在创建名单中，逐年淘汰住宅用地占比过高、有房地产化倾向的不实小镇、政府综合债务率超过 100% 、市县通过国有融资平台公司变相举债建设的风险小镇，以及特色不鲜明、产镇不融合、破坏生态环境的问题小镇。这也为下一阶段的工作指明了方向与路径。

（据梁建强、刘晶瑶：《指标“层层加码”，特色沦为“凑数”》，新华网，2018 年 11 月 30 日）

■ 郑海鸥：文物保护修旧如旧是关键

近年来，《国家宝藏》《如果国宝会说话》等节目的持续热播，以及以故宫为代表的博物馆推出的系列高品质展览，极大提升了公众对文物的热情，文物保护的观念日益深入人心。但实施文物保护，头脑发热不行，一哄而上也不可取。文物保护的前提必须是科学、专业，如若盲目实施，很容易事与愿违，甚至对文物造成二次伤害，这样的前车之鉴并不在少数。

文物修复常常都在追求极致，这显然不是普通人、门外汉可以胜任的。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中，且不说对温度、湿度、修复材料等的苛刻要求都要细致把握，修复师为了实现修旧如旧，无论是对问题的筛查、对修复流程的精细控制，还是对传统制造和修复技艺的传承和创新，都需要长久的学习、积累和领悟，耗费巨大精力。有修复师坦言，不专业的修修补补有时带来的破坏比“雨打风吹”的自然损坏更加严重，甚至带来不可逆的破坏。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科学修复、专业操作，才能算是对文物切实负起了责任。

实际上，文物保护是一件严肃的事情，“好心办坏事”也会触犯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规定，“对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修缮，应当根据文物保护单位的级别报相应的文物行政部门批准”“文物保护单位的修缮、迁移、重建，由取得文物保护工程

资质证书的单位承担”。当前，落实文物保护属地管理要求和地方各级政府主体责任，深入宣传普及相关法律并加大执法力度，提升全社会文物保护法治意识刻不容缓。不能因为个人的“出发点好”“主观不故意”而免于承担破坏后的责任，如此，才能更好引导公众的文物保护意识从单纯的热情走向理性、审慎、科学。

作为世界文明古国，我国文物规模位居世界前列，现有不可移动文物 76．7 万处、国有可移动文物 1．08 亿件/套。据调查，其中仅急需修复的馆藏文物就有 230 余万件，而国内具有一定保护修复专业技术的人员不足万人。文物保护修复技术人才的极度缺乏，已经严重制约了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当前文保领域出台的多项政策文件都强调要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健全人才培养、使用、评价和激励机制”“实施新时代文物人才建设工程”，如今当务之急是大力动员、抓紧落实，只有建设起一支体系完备、素质优良的文保专业技术队伍，才能为整体提升文保工作水平奠定坚实基础。

（据郑海鸥：《文物保护 修旧如旧是关键》，中国经济网，2018 年 11 月 29 日）

■ 田国垒：打造具有中国符号的文化 IP

在“互联网 +”的时代背景下，我国的文化 IP 行业快速发展，激活了规模巨大的网络市场，找到了我国知识产权转化的新途径，发掘并放大了文化自身的潜在价值，生成了远超其单质的巨大聚合效应。《面向高质量的发展：2017—2018 年度 IP 评价报告》显示，互联网已经成为中国 IP 和国家文化符号建设的重要舞台，参与 IP 创建最多的前五名企业全部来自互联网领域。但也应当看到，我国现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存在“有数量，缺质量”的问题，部分产品粗制滥造甚至低俗媚俗，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文化精品、文化 IP 尚未爆发式涌现。例如近年来出现大量的 IP 改编电影，因粉丝效应能够带来可观票房，引来一哄而上的跟风制作，不少粗制滥造的改编作品让粉丝极为失望，于是才造就了大量高票房低评价、“叫座不叫好”的影视作品。

种种急功近利的乱象，折射出当下文化 IP 行业存在一种非理性的心态。一个真正的 IP 应该能够凝聚用户情感，在兼顾文化价值与产业价值中获得长期消费行为。文化 IP 开发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具有知名度的文化 IP 最重要的价值是持续开发能力，而不是一次性消费、一次性开发。要打造高品质的文化 IP 精品，就应注重文化产品的质量与价值，创造既能传递文化价值、又让人们喜闻乐见的形象和品牌。

文化 IP 行业属于创意经济领域，生产力主要来自于文化 IP 的创新、延展、融合。我国丰富的传统历史文化是文化产业 IP 的最大资源库。近年来多部以《西游记》为题材的电影的上映，屡次刷新各类纪录，孙悟空已成为中国文化 IP 史上的“丰碑”。传统文化 IP 的衍生作品既会受到消费者的喜爱，又可以传递正能量的文化价值观。我国古代花木兰的形象家喻户晓，现在已有很多改编的影视、动漫、游戏作品，向人们传达了勇敢、孝顺、正义的价值观；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中静谧的文化氛围深受观众喜爱，影片所传达出的匠心精神也影响了很多人。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雕塑、书画等文化艺术形式，同样具有很大的挖掘价值。

（据田国垒：《打造具有中国符号的文化 IP》，《中国文化报》，2018 年 11 月 16 日）

■ 王垚：短视频扛起文化输出的重担

短视频出海始于2015年，抖音和快手以日韩以及东南亚作为主打的海外市场，同时进军欧美市场，并且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资本是逐利的，或许这些公司的本意不过是为了扩大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从而更好地达到盈利的目的，但从事实来看，他们也确实在无意之间承载了对外文化输出的工作。庞大的下载量与覆盖范围提供了庞大的用户群，短视频APP的出海不仅仅为文化输出提供了管道，也在无形之中提供了文化输出的受众。

在支持短视频的人看来，短视频出海是一波成功的文化输出，是扬我国威；但在讨厌的人看来，这么low的文化传播出去让我国苦心经营多年的形象毁于朝夕，配不上文化传播这么高雅的词。可文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广泛而又极具人文意味的概念，其不仅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具有意识形态性质的部分，也包括自然科学和技术、语言和文字等非意识形态的部分。在中国一切人文活动所产生的言行都应属于中华文化，只不过我们只承认那些弘扬了真善美的而已。

如此看来短视频确实传播了文化，只不过文化也分好坏优劣，有高雅自然也就有低俗。阳春白雪固然高雅，可难免曲高和寡，下里巴人才能被更多人接受。每个国家都想着直接输出本国的文化，尤其是“主流核心文化”，然而这样的主流文化在传播过程中往往不具有竞争力。如国家京剧院、孔子学院这样的传播途径必不可少，因为这才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千百年来薪火相传的本，但在这个信息化时代，文化传播的主力是那些更快餐、更流行的文化。对于这些出海的短视频来说，他们在输出了流行文化的同时也会成为传统文化的载体。毕竟总会有人在为某些网红城市着迷的同时，深度挖掘其背后所承载的文化底蕴，这就自然而然地触及了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以及一些更深的东西。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输出流行文化的是短视频，而并非作为输出管道的短视频APP，但后者同样重要。在这些出海的短视频APP做大了之后，能实现数据上的互通，更好地展示我国的风土人情，承担起管道的作用。拥有了文化输出的管道，也就拥有了掌握话语权的能力。之所以至今还有相当一部分外国人对于我国现实情况存在误解，很大一部分原因还是在于西方媒体的妖魔化宣传。事实分为两种，真正的事实以及舆论认为的事实，前者只有当事人或目击者自己知晓，而后者却是受舆论引导的，谁的声音大、发声渠道多自然也就掌握了话语权，他所说的话也就成了舆论事实。走出海外的短视频平台，起到的正是这样一个作用。因此，无论从文化传播的内容还是文化传播的渠道来看，出海的短视频与短视频平台能起到积极作用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我们也应当抱着更加客观与宽容的心态去看待它们。

（据王垚：《当短视频无意间扛起文化输出的重担》，文化产业评论公众号，2018年11月28日）

■ 李铁：以智慧的方式解决城市综合治理问题

智慧城市并不是设计出来的，当所有相关的智慧产品在社会和城市领域得以综合

应用，才能形成所谓的智慧城市。现今的城市治理不应该再停留在拆迁改造、大动钢筋混凝土的方式上，管理者需要调整角度，拓展新的思维模式，以智慧的方式来考虑城市综合治理。

在交通管理这一问题上，首先，利用大数据是最好的办法。通过移动端手机信令数据和网络数据对居民的出行进行实时追踪，掌握区域内昼夜车流量、出入情况、停留情况等，可以准确分析区域内外通行流量的峰谷时段，从而得出一个综合性的交通解决方案。同时，大数据也可以用来尝试解决泊车问题，通过大数据收集昼夜停车数量和区域等信息，分别计算供应紧张和仍有潜在容纳能力的车位，从而可以解决车位不足和盲目泊车影响交通畅通等问题。

其次，通过智慧、智能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应用大数据化的交通信号灯系统，根据大数据测算的流量规律来调整区域内交通信号灯时长。城市交通拥堵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车辆的总拥有量；二是突发性事件导致的临时拥堵，后一种情况不能单靠大数据信号灯系统来解决，可以考虑在信号灯系统中引入人工智能技术，通过路口信号灯监控车行流量情况，智能识别突发性事故，临时调整信号灯放行频率，同时通过智能的方式联动事故路段周围所有信号灯做出相应调整。

第三，要考虑共享的方式。有数据显示，自共享单车投放以来，北京某城区的交通通行率提高了 22% 左右，可见提高共享单车利用率必然能够降低交通拥堵率。对于共享单车的乱停放问题，可以考虑由政府和社会出资，在城市公共空间建自行车棚，应该可以有效减少乱停乱放问题。此外，共享的另一种形式是共享汽车，通过大数据计算城市内热门路段的平均每辆汽车出行人次，尝试通过政策鼓励两到三人搭车出行，可以提高汽车利用率，减少汽车出行数量。对于共享汽车引发的安全问题不能忽视，也不能因噎废食。司法大数据专题报告显示，网约车的案发率低于传统出租车。如果没有共享出租车，黑车泛滥造成的恶性案件会更多。共享汽车这类新兴事物，在发展初期往往会引发各种问题，对于相关经营企业而言，安全问题敦促其必须及时通过技术手段做出改善升级；对于政府来说，对待新兴事物应该以是否方便社会、方便居民为第一原则，同时在政策层面提高安全保障。

（据李铁：《以智慧的方式来解决城市综合治理问题》，城市中国网，2018 年 11 月 4 日）

5. 海外视野

■ 美国：通识教育要解决把学生培养成什么人的问题

通识教育是 1917 年到 1919 年之间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关口，美国人对自己的国家为什么要介入世界大战很是想不通，表现出了抵触情绪。美国政府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必须从教育上着手解决，于是决定出钱资助大学，让他们开一门叫“战争问题”的课。这门课主要宣讲美国的政策，解释美国为什么要介入这场战争：美国继承了西方文明，而现在西方文明受到了威胁，这场战争不是哪

个洲的地域性问题，而是关乎人类文明的问题。一战结束后，哥伦比亚大学继续开设了相关课程，以继续引导学生思考这样的问题：我们来自何方，我们的文明继承自何处，我们的文明反映了人类共有的何种东西？也就是培养学生对于欧洲文明及其价值的认知与认同。这种做法受到政府的认同，并被其他大学学习。

至二战将结束时，时任哈佛大学校长的柯南特发动了一场针对美国大学教育的讨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美国大学培养的人才在战后如何成为西方文明的维护者。他认为，科技进步使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大大加快，也使社会随之发生急速的变化，导致社会阶层高度分化，人们的意志无法统一，社会不能形成共同的价值观。他对此深感忧虑，想通过大学的通识教育来培养未来社会精英们的社会责任感。于是，柯南特在哈佛推动了一场课程体系改革。他任命了一个由 13 名教授组成的委员会，专门讨论“自由社会中通识教育的目标”问题，并在 1945 年形成了一份报告，题目是《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

报告将学校教育分为专业教育与通识教育，通识教育所要解决的是把学生培养成什么人的问题，而专业教育解决的则是职业技能的问题。具体到美国学生，报告强调要通过通识课程向他们传达“三个共同”的理念：共同的历史——美国人是从欧洲而来；共同的现在——大家走到一起形成美国社会；共同的未来——我们还要一起走向未来。报告希望通过传达这些理念使学生明白，西方文明是当前人类最好的文明，所以要继承它，并成为它的捍卫者。而一个学生要想做到这一点，就需要了解人类的历史，具有历史的眼光与意识；需要了解财富的形成，掌握相关的基本经济原理；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具有科学精神，等等。报告以及哈佛大学的这场改革影响巨大，标志着所谓“通识教育运动”在美国的兴起，而这份报告则被一些历史学家称为“通识教育运动的‘圣经’”。

1947 年，美国高等教育委员会发表的《为了美国民主的高等教育》，报告强调通识教育重在全面育人的观点，指出：“通识教育是要给学生某些价值、态度、知识和技能，使其在自由社会中生活的正确而美好，要让学生对其现实生活中的富丽文化遗产、现存社会中的可贵经验与智慧能够认同、择取、内化，使之成为个人的一部分”，使学生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称职的父/母亲，一个健全的公民”。上述两份报告奠定了美国大学通识教育的理论基础，使之得到更加广泛的推行。此后，美国各主要大学都会根据时代的变化而对自己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做出调整和改革，但“培养什么人”始终是关注的中心。

（据石云里：《西方通识教育的启示：要解决的是把学生培养成什么人的问题》，腾讯网，2018 年 11 月 5 日）

■ 法国：大力支持私企和个人购买“国宝级艺术品”

在法国，最近一部有关文物收藏的法律是在 2002 年 1 月 4 日颁布的《法国博物馆法》，该法律是法国针对博物馆领域制定的最为全面的法律，其中与文物有关的内容涉及：改善对藏品的保护；保证藏品的所有权；保证藏品的管理模式；检查新获藏品的质

量及修复工作的质量；接受国家严格的科学检查，以确保藏品及保护过程的安全等。

该法律规定：国家对被列为“国宝级艺术品”的文物进行重点监控，以保证其不流出法国国境。法律还规定对被列为“国宝级艺术品”的文物，在其出口许可申请被拒绝后的30个月内，文化与新闻部可向其拥有者提出购买要求。如果国家放弃购买，该文物才可以离开法国国土。在国家财政拨款有限的情况下，为获得充足的购买“国宝级艺术品”的资金，鼓励法国私营企业和个人积极参与“国宝级艺术品”的保护，《法国博物馆法》中新增了两个条款：当私人或私营企业为国家购买“国宝级艺术品”而出资时，可以获得税收减免；当私营企业为自己购买“国宝级艺术品”时，也可获得一定比例的税收减免。

该法律第一次对企业和个人资助博物馆艺术品收购可获得税务减免做出了规定：企业出资帮助国家购买被定为“国宝级艺术品”的，将享有相当于其出资金额90%的税务减免优惠，减税金额最高不超过其应缴纳税金的50%；企业出资帮助国家购买非国宝级文物，享有60%的税务减免；企业为自己购买一件国宝级文物，享有其出资金额40%的税务减免，并明确规定，艺术品须在法国的博物馆内展出10年，且在此期间不得再出售。2003年8月1日颁布的法律进一步加大了促进和鼓励企业和个人对文化事业的资助力度，在之前法律中规定的针对企业和个人帮助国家购买“国宝级艺术品”的税务减免扩大到对购买“具有重要利益”的艺术品，即历史、艺术和考古价值低于国宝级的并在法国本土或以外的艺术品。此外，对企业和个人资助博物馆除收购艺术品之外的项目给予相当于其资助额60%的税务减免，同时减免额度上限有所提高：针对个人，减税额度从不超过其可征税收入的10%提升至20%；针对企业，减税额度从不超过其营业额度的2．5‰提升至5‰。在2004年7月13日出台的补充法律条款中再进一步规定，企业对博物馆收购艺术品进行资助，可以享受相当于其资助总额5%的税务补偿。

（据教堂：《法国新政：大力支持私企和个人购买“国宝级艺术品”》，《中国文化报》，2018年10月11日）

6. 研究院之声

■ 我院邀请著名学者李陀做学术讲座

11月10日，我院邀请著名批评家、作家、文化研究学者李陀做题为“四十年来中国时代变迁中的思想立场”的学术讲座，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孟庆澍教授、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季剑青研究员参与对谈。李陀先生从文学偶像的消亡史谈起，重点阐述了他对“手机社会”的理论思考；孟庆澍老师主要就小资产阶级话题发表了看法；季剑青研究员认为在“手机社会”中，知识分子的争论越来越不可能。结合学者发言，在场观众与李陀老师和两位嘉宾就知识的界定、知识分子群体的分众化、手机社会的自我主义和知识分子应有的特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本次讲座由我院副院长张翔主持。

■ 我院举办“故宫文物医院”主题文化讲座

11 月 12 日晚，我院邀请故宫文物医院院长宋纪蓉教授做“故宫文物医院”主题文化讲座。首都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徐志宏出席并致辞，我院常务副院长李焕喜、副院长乔卉和研究人员参加讲座。宋纪蓉院长主要介绍了文物医院的建立基础和建立过程，结合古书画的装裱修复技艺、青铜器的修复复制技艺、古书画临摹复制技艺、古代钟表复制技艺等四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介绍了故宫文物医院承担的文物修复工作，提出文物保护工作要科学化，同时也要与经验相结合。最后，我院副院长张翔主持讲座并做总结发言，他表示，今后我院会以故宫博物院为主要案例，进一步推进对文化机构管理工作的研究。

■ 我院举办“革命文物与红色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学术沙龙

我院于 11 月 14 日上午举办“革命文物与红色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学术沙龙，邀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原主任彭红、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副馆长佘志宏、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人文与创意城市研究所主任工程师杜凡丁、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助理教授刘亦师和北京联合大学历史文博系副教授李扬进行专题研讨。我院领导及全体研究人员参与讨论。沙龙由我院副研究员陈国战主持。研讨中，各位专家就红色革命文化遗产的保护思路和研究视角进行探讨，同时提出了在红色文化遗产保护中应当注意的问题。最后，我院常务副院长李焕喜做总结发言。

■ 我院召开“艺术节庆与北京乡村旅游发展”专家座谈会

我院与首都师范大学创意产业与传媒文化研究中心于 11 月 16 日共同召开“艺术节庆与北京乡村旅游发展”专家研讨会，北京舞蹈学院教育学院副院长、中国艺术管理教育学会的副会长张朝霞教授；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釜山电影节中国顾问范小青教授；中景旅游管理有限公司副总裁王蕾女士；西宁 FIRST 青年电影展的联合创始人李子为女士；摩登天空拓展总监赵忱先生；首都师范大学创意产业与传媒文化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包晓光、罗赟、郭嘉，以及我院常务副院长李焕喜、副院长乔卉、张翔以及全体研究人员参与讨论。本次座谈会由我院研究人员郑以然主持。我院常务副院长李焕喜教授做总结发言。他指出，此次座谈会旨在为北京建设有品牌影响力的艺术节庆、打造北京作为文化中心的城市名片做出贡献。我院将基于两个平台，始终坚持做文化产业从业者与政府政策制定者的沟通中间人和信息传递人，加强资源整合，推动研究院与多方交流协作，共同为北京市全国文化建设做出贡献。

■ 我院举办“考古发掘出土遗存的保护与管理”研讨会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新世纪以来，我国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无数珍贵的文物不断涌现。针对这些发掘出土的文物，如何做好研究、保护、展示和传承，尤其是处理好考古发掘品和博物馆馆藏之间的衔接问题，目前在政策法规(管理、归属权等)和

实际操作(执行时间、部门协同等)等方面尚存在不健全之处。鉴于此，11 月 19 日，我院和公众考古学中心联合召开“考古发掘出土遗存的保护与管理”研讨会，原中国历史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孔祥星、原首都博物馆常务副馆长崔学谙、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北京市文物局博物馆处处长范军、中央民族大学博物馆学教授潘守永、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袁广阔、钱益汇等先后发言。本次研讨会由我院研究人员蒋璐和历史学院副教授王涛主持，我院常务副院长李焕喜做总结发言。

■ 我院举办“直播/短视频内容生产前沿和网络生态治理”专题研讨会

我院于 11 月 21 日上午举办“直播/短视频内容生产前沿和网络生态治理”专题研讨会，邀请学界业界专家共同开展研讨。来自“北京时间”、花椒直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北京语言大学的专家学者共同参与讨论。“北京时间”副总裁王星首先就“北京时间”泛资讯短视频的内容生产和发展经验做了分享。花椒直播的联合创始人、副总裁于丹和公共事务部负责人鲁林分享了花椒直播的经营模式和发展特征。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洪喆研究员分析了快手和抖音两大短视频平台在发展路径上的差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虞鑫研究员着重对比了不同视频平台的特征。北京语言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张海华从哔哩哔哩网站的“吃播视频”这一具体案例入手，探讨了短视频内容与受众之间的关系。最后，我院常务副院长李焕喜做了总结发言。

■ 我院举办“新形势下互联网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学术沙龙

为了充分认知当前网络治理的现状、性质和构成，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方案，11 月 21 日下午，我院召开“新形势下互联网治理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学术沙龙，邀请各领域关注互联网治理的五位专家学者共同探讨这一议题。我院领导及研究人员出席此次沙龙。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欧树军从网络空间可治理性的角度展开讨论。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院资深研究员谢茂松从技术安全、国家安全、人文价值观等多方面，分析了数字化过程面临的种种问题和挑战。北京大学国家战略传播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维佳从自身研究出发，讨论了互联网企业的金融化趋势。人民网研究院研究员刘扬提出，中国互联网经历了一个“无力”与“失控”的阶段，网络实名制正是这一“无力”的表现。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樊鹏认为，互联网的核心问题在于互联网技术与市场运行、社会权力之间的关系。会议最后，我院常务副院长李焕喜做总结发言。

（本期助理：邵晓雪、张羽欣）